

谢·米·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理念及其价值

郭 丹 周巩固

【提要】 谢·米·索洛维约夫是19世纪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西方派成员。在29卷《远古以来俄国史》中,索洛维约夫提出了如下俄国史理念。在历史起源问题上,地理因素是塑造俄国历史的“长时段”,是俄国(东方)历史与西欧(西方)历史具有差异性与相似性的深层动力。在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自远古至现代,从西方到东方的宗教传播是东西方交流过程的一条核心线索。俄国据此完成了思想启蒙,构建了俄国国家的宗教认同。在历史发展趋向问题上,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向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国家过渡和转型,是贯穿与凝结俄国发展的核心线索,是俄国与西欧历史发展的同质性趋向。在俄国史学史上,索洛维约夫批判了斯拉夫派的俄国史观念和当时主导俄国史坛的卡拉姆津史学观念,推动了19世纪下半叶俄国历史学的发展历程。索洛维约夫的历史书写实践,体现了关注现实的特点。

【关键词】 谢·米·索洛维约夫 俄国史理念 西方派 《远古以来俄国史》

1757年,伏尔泰受俄国女皇伊丽莎白之邀,赴彼得堡撰写彼得大帝的历史。伏尔泰在写成的《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史》结尾处呼吁:“应该由俄国本国的历史学家来详细叙述他们本国的基础的、法律的、战争的以及彼得大帝的各项事业的细节。”^①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一位俄国历史学家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索洛维约夫(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ев,1820—1879),从1851年至1879年,陆续出版《远古以来俄国史》29卷。索洛维约夫1838年进入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学习,1842年到欧洲游学。1845年,索洛维约夫获得硕士学位,开始在莫斯科大学讲授俄国历史,“在40年代中期和后半年,他坚定地加入了由Т. Н. 格拉诺夫斯基领导的莫斯科西方派”。^②1847年,索洛维约夫获得博士学位,成为莫斯科大学正式聘任的教师。1864年到1870年,索洛维约夫任莫斯科大学历史系与文献学系的主任。1871年到1877年,索洛维约夫担任莫斯科大学校长。前述这部多卷本著作奠定了索洛维约夫在当时俄国史学界和整个俄国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在研究索洛维约夫的学术史上,苏联时期的学术研究和文献整理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苏联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十月革命之前的俄国历史科学发展历程。当时的代表性观点是将索洛维约夫看作“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区别于索洛维约夫之前以尼·米·卡拉姆津为代表的贵族历史学家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③在这种判断之下,索洛维约夫当时在一定程度上被划入俄国史学史的负面资产清单。20世纪70年代尤其是苏联解体之后,俄国史学界开始关注和重视以索

① 伏尔泰《彼得大帝在位时期的俄罗斯帝国史》,吴模信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327页。

② Дмитриевым С. С.,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Историк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ев. Его Жизнь, Труды, Науч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I. Москва (мысль), 1988. С. 13.

③ Черепнин Л. В. Соловьев Как Историк. //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I. Москва, 1959. С. 5.

洛维约夫为代表的国家学派史学研究。^①另一方面,从1959年至1966年,29卷《远古以来俄国史》出版。^②这个版本目前是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最全面、最权威的版本。这为当代索洛维约夫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文本基础。改革开放以来,对俄国的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研究是国内史学界研究的热点课题之一。国内学界对斯拉夫派的观点已有专题研究或深入探讨。^③不过,国内学界对西方派尤其是索洛维约夫历史学观点的考察,还缺乏专门研究。本文基于1959年至1966年出版的索洛维约夫《远古以来俄国史》的文本分析,在借鉴俄国和国内学界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系统地梳理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理念并评述其学术价值:从地理因素分析俄国历史的起源及东西欧历史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从宗教角度阐释东西欧发展的不平衡性及俄国学习西方的必然性;从国家形成角度指明俄国发展方向及其与西欧发展的同向性。索洛维约夫的历史书写既批判了斯拉夫派的俄国史观,也推动了俄国史学的发展。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理念突出俄国与西方的共性、关联和发展特质,满足了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后俄国社会的历史认知需求。

一、地理环境:俄国历史起源的“长时段”

19世纪30年代,俄国教育大臣谢·乌瓦罗夫为了捍卫农奴制,在俄国社会和各级学校中宣传下述观点“农奴制和专制制度……不仅是俄国存在的基础,而且也是对抗‘动乱’和‘腐化’的西方的武器,是不可动摇的”。^④19世纪40年代,俄国思想界进行了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辩论。尽管学术观点存在分歧,但两派思想家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农奴制度的罪恶。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后,沙皇尼古拉一世惧怕西欧革命风暴波及俄国,进一步加强专制统治,强制阻断俄国与西欧的联系。这一政治现实使斯拉夫派与西方派辩论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俄国历史起源问题是这一阶段双方争论的焦点。

在俄国历史起源问题上,斯拉夫派坚持的基本立场是:俄国与西方历史在起源上就是不同的。斯拉夫派的阿列克谢·斯捷潘诺维奇·霍米亚科夫指出,俄国历史的基础之一“是共同的信仰和宗教生活”,但俄国历史“缺乏自然因素”。^⑤霍米亚科夫突出信仰对俄国历史发展的首要意义,否认自然因素对俄国历史的作用。他的这一立场也代表和影响了斯拉夫派的俄国历史解释模式。另一位斯拉夫派代表人物亚·伊·赫尔岑常被提及的名言是“在欧洲眼里俄国是个亚洲国家,在亚洲眼里俄国则是个欧洲国家。这种两面性与它的性格和命运完全相符,这决定了它应该成为一个介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伟大文明”。^⑥在赫尔岑这里,俄国与欧洲、亚洲的地理差异,只是他区分东欧和西欧进而强调东欧独特性的客观背景。这种地理差异并未进一步成为他分析俄国历史的解释因素。同霍米亚科夫一样,赫尔岑强调的仍是“宗教”“道德”等因素在俄国历史上的首要意义。这两位斯拉

① 曹维安《俄国史学中的“国家学派”》,《史学理论研究》2006年第1期。

② 根据笔者收集的信息,在20世纪,《远古以来俄国史》出版两次。第一次是1959年至1966年,苏联学界在1851年至1879年版本的基础上,重新出版了29卷《远古以来俄国史》。第二次是1988年至1989年出版的8卷本《远古以来俄国史》。

③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刘爽《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兼论俄罗斯史学的功能与特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曹维安、郭响宏《俄国史新论: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到彼得堡罗斯》,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④ 于沛、戴桂菊、李锐《斯拉夫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53页。

⑤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肖德强、孙芳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页。

⑥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40页。

夫派代表人物表述的俄国历史观,否定或轻视地理环境对俄国历史的影响。

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在地中海历史研究中,归纳和运用了时段理论,地理环境所代表的“长时段”是三个时段中最为基础性的。虽然所处时代和国家不同,但19世纪俄国历史学家索洛维约夫在解释俄国历史起源问题时,同样赋予俄国地理环境“长时段”地位。与斯拉夫派上述观点相对,索洛维约夫认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生活中,有三个条件是决定性的,即民族自身的特点、所处的环境和与其他民族的关系”。^①这里所说的环境,首先是指地理环境。在《远古以来俄国史》第13卷开篇,索洛维约夫以设问方式展现了地理环境在历史起源过程中的作用,“已经证明,起源时期历史通常选择条件最好的土地,从那里开始欧洲历史的逐渐进步:从南欧到北欧,从西南欧到东北欧。东欧平原上情况与此相同。……在这更优良的土地上,俄国早期历史开始了”。^②索洛维约夫认为,无论是在东西欧之间,还是在东欧内部,历史起源的基础都是地理环境。但索洛维约夫并未停留于宏观评判地理环境作用这一层面。

具体到国家形成问题上,索洛维约夫基于当时欧洲地理学界的研究认为地理因素是共同影响西欧和东欧历史的基础性因素“西欧是岩石或石头的欧洲。东欧是树木或森林的欧洲”。^③这种客观地理状况将欧洲划分为特点鲜明的两个区域即西欧和东欧。由于西欧和东欧具体地理状况不同,使地理因素在西欧和东欧分别呈现出不同的历史效用。上述地理环境在西欧的作用是积极的,“正是这样的岩石将西欧分成很多国家,创造了很多民族的边界。西欧贵族用石头建造他们的城堡,在城堡中辖制他们拥有的农奴。正是石头使西欧贵族独立。……由于石头,一切才得以稳固且界限清楚”。^④而东欧所赋有的地理环境作用则是消极的,“东欧平原没有石头。一切都是水平的,没有民族多样化。因而,在东欧产生了一个规模空前的国家。没有地方可以让权贵们为自己建造石头城堡。……在缺乏多样性和明确界定的地方边界前提下,俄国民族没有发展出显著的地方差异”。^⑤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西欧的岩石高地有利于西欧形成诸多边界清晰的民族国家。东欧广袤的平原使俄国缺乏清晰的边界,延缓了国家形成过程。这是索洛维约夫对西欧国家形成领先于东欧的地理角度的解释。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地理环境对东西欧民族关系状况同样具有塑造作用。在这个问题上,“平原”和“草原”是索洛维约夫在历史解释中运用的一对隐喻。在他看来,这也是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一对矛盾。如前所述,东欧面临的客观地理环境是平原。俄国人居住在东欧平原上,过着定居生活。与这些平原相邻的草原,居住着过游牧生活的亚洲游牧部落。因此,平原是俄罗斯等定居东欧民族的象征,草原是亚洲游牧民族的象征。像亚欧大陆民族大迁徙过程一样,俄国人在其历史发展进程中与这些亚洲游牧部落不断地冲撞和融合。不同于有明确边界的西欧,地处平原的俄罗斯人没有天然地理屏障。这种地理环境使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断遭受来自草原的亚洲游牧部落的攻击,“经历了这些民族的迁徙,草原边界并没有改变它的性质。游牧民族四处游荡,互相冲撞:波洛维茨人压迫着佩彻涅格人,鞑靼人挤走了波洛维茨人”。^⑥所有这些游牧民族侵袭,在索洛维约夫看来,都是俄

① Сили Ш.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и Источники Теории «Колонизации» С. М. Соловьев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6. 2002. С. 151.

②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Москва, 1962. С. 21.

③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С. 46.

④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С. 46.

⑤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С. 46.

⑥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2. Москва, 1961. С. 573.

国所处的“平原”这种不利地理位置决定的。因此，“平原”在索洛维约夫这里成为“不利地理环境”的代名词。这种不利地理环境，也给俄国历史造成消极影响。

俄国历史上与此相关的一个事件是，1240年蒙古入侵罗斯并在罗斯建立了持续两个半世纪的统治。索洛维约夫将“平原”这一地理因素作为解释这一历史事件的原因之一。同时，蒙古入侵体现着俄国历史上“平原”与“草原”这一对基本矛盾激化，因此大大延缓了俄国历史发展进程，“在这项研究开始时，我注意到俄国没有明确的自然边界……自然对确立俄国的国家主权和独特性提供了很少的支持”。^①在此，地理环境不仅塑造着俄国民族关系状况，也影响着俄国国家命运。“索洛维约夫能够如此生动而有意地评价和发现东欧平原历史生活的地理状况。这种地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庞大国家的命运。这个国家是相对分散稀少的人口在幅员辽阔的国土上缓慢建立起来的”。^②与此相对，斯拉夫派思想家霍米亚科夫将1240年蒙古入侵罗斯解释为上帝对俄罗斯人的“惩罚”：“一场可怕的风暴从东方袭来……上帝仿佛在召唤我们统一和联合起来，但教会却保持沉默……人民继续无动于衷，王公们继续自己的内讧。惩罚是公正的，蜕变是不可避免的”。^③在两种历史解释的对照下，西方派学者索洛维约夫的解释显得更为合理。

以“平原”为代表的地理环境是俄国历史发展的结构性制约因素。但索洛维约夫并没有就此陷于地理环境决定论的观点。索洛维约夫在历史叙述中强调“人”的能动作用，强调俄国人削弱和克服不利地理环境影响的努力和能力。这一过程的体现是，俄罗斯人在历史上不断克服不利的“平原”的制约，逐步走向有利的地理环境即“海洋”。这典型地体现在索洛维约夫对彼得一世建造圣彼得堡的叙述中：“莫斯科在17世纪没有达到它在16世纪的规模和人口数量。然而，时间飞逝，罗斯最终必须走向海洋，涅瓦河口的沼泽海岸成为帝国首都所在地”。^④“彼得一世最终成功占领涅瓦河，在大水路开始处、在湖泊系统的关键结合点站稳脚跟。彼得一世在涅瓦河入海口建立圣彼得堡。处于大水路开端的这个位置，即使现在也连接欧洲与亚洲，决定了圣彼得堡作为首都的特殊重要性”。^⑤1703年，彼得一世在涅瓦河口建造新都圣彼得堡。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这一历史事件是俄罗斯人成功克服不利地理环境限制的结果，标志着罗斯历史发展重心由陆地转向海洋。由此，我们不仅看到，俄国历史上莫斯科罗斯与彼得堡罗斯两个历史阶段的承接与转换，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理解了这一历程是俄国“走向海洋”和“学习海洋国家”的结果。彼得一世之后的历史证实了这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在索洛维约夫的历史解释中，海洋不仅是一个自然因素，也是一个代表着“进步”的隐喻。在这方面，索洛维约夫提到清代中国因为自身的优越感，即“这种中国式态度是，认为自身高度完美。这种确信是，由于中国优越的地理位置，中国优于世界上的其他所有民族”，^⑥并没有走向海洋的发展历程。因此，在索洛维约夫看来，清代中国并没有也不可能成为俄国学习的榜样。

河流在罗斯历史发展中具有重要影响。索洛维约夫指出，不同河流系统是罗斯行政区划的地理基础，“罗斯土地在古代按照四条主要河流系统划分为四个区域。第一个是诺夫哥罗德湖省。第二

①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0. Москва, 1960. С. 374.

② Пресняков А. Е. С. М. Соловьев в его Влияни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Валк С. Н., Носов Н. Е., Пемров В. А.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и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я Истории СССР. Москва, 1963. С. 80.

③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14页。

④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С. 49 - 50.

⑤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Москва, 1959. С. 64.

⑥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С. 112.

个是西德维纳河省,即克里维奇安或波洛茨克省。第三个是第聂伯河省,是真正的古代罗斯省。第四个是上伏尔加省、罗斯托夫省”。^①除了这里的行政区划,索洛维约夫也将地理因素看作俄国国家统一的基础性因素,“罗斯领土的历史分割是由不同河流系统限定的。显而易见的是,每个地区的大小与河流区域的大小是相对应的。由于伏尔加河超过了所有其他河流,因此莫斯科公国领土比其他地区都大。自然倾向是,小的地区应归附大的地区”。^②这种地理状况决定了莫斯科公国是其他地区归附的对象。这是索洛维约夫对俄国统一必然性的地理解释。

索洛维约夫强调地理环境在俄国历史起源和发展过程中的基础性意义。《远古以来俄国史》所呈现的9至18世纪这一“长时段”锻造了俄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性和差异性。共同性体现在,地理因素是决定俄国与西方历史的共同起源和“深层解释”。差异性体现在,相较于西欧地理环境,俄国地理环境决定了俄国历史在边疆特征、周边民族关系、行政区划方面的独特性。一方面,索洛维约夫以这种强调地理因素的历史书写,回应了斯拉夫派思想家“重视信仰”和“轻视自然因素”的历史解释方式。另一方面,索洛维约夫并未将地理因素看作俄国历史发展过程的背景或衬托因素,而是在俄国历史起源、特征、发展路径等方面展现地理环境对俄国历史的构建作用。

在俄国史学史上,“全面地评论自然地理、人口民族和外交政策因素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索洛维约夫的一个开创性功绩”。^③当时的国家学派其他成员契切林、卡维林也承认地理环境在俄国历史发展中的影响。^④索洛维约夫强调地理环境影响历史的观点,影响了后世俄国历史学家的研究。他的学生瓦·奥·克柳切夫斯基的《俄国史教程》第四讲就专门讲述自然环境影响。当代俄国历史学家Л. В. 米洛夫从实证角度证明了15至19世纪这四百年中,“自然气候因素对社会类型的形成有巨大影响”。^⑤索洛维约夫的这种学术影响,正如克柳切夫斯基所说“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必须从索洛维约夫的研究开始,才能直接而坚定地开展工作。索洛维约夫就像一座灯塔,将长期作为这条道路的第一个路标”。^⑥当时的斯拉夫派思想家极力彰显俄国独特性的观点,与当时沙皇政府隔断俄国与西欧联系的统治政策不谋而合,呈现出保守主义倾向。索洛维约夫从地理环境角度,在承认俄国与西方差异性的前提下解释了双方在历史起源上的共同性。这一方面回应了斯拉夫派的上述观点,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一种着眼于俄国与西方共性的历史解释。在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夕,这一历史解释具有回应社会问题和推动改革的现实效用。除了强调地理环境的作用外,索洛维约夫在《远古以来俄国史》各卷中,还从东西方互动的世界历史背景下阐述宗教对俄国历史发展的作用。

二、东西交融:俄国历史发展的宗教认同

在宗教认同问题上,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持对立态度,由此对俄国历史提出了相反的历史解释。

①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I. С. 63.

②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I. С. 73.

③ Дмитриевым С. С.,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Историк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ев. Его Жизнь, Труды, Науч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С. 29.

④ 曹维安、郭响宏《俄国史新论:从基辅罗斯、莫斯科罗斯到彼得堡罗斯》,第209页。

⑤ Милов Л. В. Природно-климатический Фактор и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Историче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 // 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No. 4 - 5. 1992. С. 53.

⑥ Пресняков А. Е. С. М. Соловьев в его Влиянии на Развитие Рус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 С. 76.

斯拉夫派强调俄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主张依靠东正教、农村公社和集体主义价值观这些俄国特有的历史传统,实现自身发展。霍米亚科夫在1839年发表的《论旧与新》一文中指出,在彼得一世统治时期,“随着俄国帝国的形成和巩固,社会最初的、淳朴的和宗法的状态的痕迹便逐渐地被抹掉。城市的特权消失了,市民大会停止起作用,千人长的袒护权被废除,门阀制度兴起,贵族体制确立,人们被束缚在土地上,苟且偷生,善良道德只保留在僵死的形式中,丧失了从前的内容”。^①整体而言,霍米亚科夫的这一观点也体现了斯拉夫派的立场:俄国要寻求历史发展出路,就要回归彼得改革之前的宗教传统,“否定彼得改革是斯拉夫派与西方派极端对立的主要立场之一”。^②由此,彼得改革之前的俄国是斯拉夫派眼中“理想的”和“美好的”过去,与彼得改革之后“西方化的”并且“腐坏的”现代俄国截然相反。斯拉夫派将俄国与西方对立,将俄国古代历史与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现代历史割裂开来,体现一种东方与西方对立、过去与现在割裂的俄国史观。

索洛维约夫在《远古以来俄国史》中关注宗教认同问题,着眼于回应斯拉夫派的观点。他将西方视为欧洲文明的“中心”,把俄国看作欧洲文明的“边缘”。先进与落后分别是欧洲文明“中心”与“边缘”的主要特征与差别所在。但与斯拉夫派不同,索洛维约夫认为欧洲文明“中心”与“边缘”并不截然对立,东西方发展并非遵循完全独立自存的道路。宗教传播是将俄国与西方联系起来的核心纽带。在古代历史上,西方信奉基督教,俄国盛行异教。在索洛维约夫看来,这是西方先进而俄国落后的主要体现。俄国接受基督教,其文化和社会原因是落后民族为先进民族的文化所吸引,“我们注意到,在欧洲各地,无论是在东欧还是在西欧,野蛮人尽管蹂躏了罗马帝国的行省,从东西欧罗马君主那里搜集贡品,却始终怀着对帝国的崇敬之情。因为这里的精致生活方式吸引着野蛮人的想象。这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民族与受过教育的民族之间关系的常态。……罗斯人有好奇心去观察这个受过教育的世界的奇迹”。^③从历史发展趋势看,索洛维约夫认为俄国异教必然败给西方基督教,“俄国异教如此贫乏,如此没有特色,以至于它无法与当时欧洲东南部存在的任何宗教成功地进行争论,尤其是与基督教”。^④

按索洛维约夫的历史评价标准,罗斯接受了基督教,就与西欧国家具有共同的宗教标识,就进入了欧洲国家共同体。此前,日耳曼人一般是基督教和文明的同义语。斯拉夫人一般是异教和野蛮的同义语。^⑤《往年纪事》记载“弗拉基米尔像罗马新的君士坦丁大帝一样,自己接受了洗礼,又为他的臣民举行了洗礼。如果以前弗拉基米尔追求邪恶的情欲,那么后来他已真诚地忏悔……这就是为什么罗斯人想起神圣的洗礼,就敬重追念他”。^⑥基督教不仅是西欧国家的认同标识,也成为俄国的国家认同标识。

俄国皈依基督教开启了俄国历史的启蒙历程,表现是俄国逐渐普及教育,识字率逐步提高。索洛维约夫认为,“教育与宗教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果有人读了很多书,那就意味着他精通宗教。这是一个强大的宗教趋势的起源,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传播识字和获取书籍的愿望”。^⑦斯拉夫派与西方

① 徐凤林编《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99—100页。

② 白晓红《俄国斯拉夫主义》,第101页。

③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I. С. 158.

④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I. С. 178.

⑤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I. С. 191—192.

⑥ 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朱寰、胡敦伟译,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105、106页。

⑦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3. Москва, 1960. С. 73.

派在俄国史的历史解释中,都使用“旧俄国”和“新俄国”这样一对历史术语。在索洛维约夫看来,推动“旧俄国”向“新俄国”转变的动力之一,就是由西向东的宗教传播。

东西欧由于宗教上的相似性,塑造了历史发展过程上的联动性,“我们历史的早期阶段与西欧历史有着比初看时更为明显的共同点。重要的宗教问题,即伴随着路德改革而来的西欧教会冲突,也对东欧乃至我们自己祖国的命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无论是西欧还是东欧,17世纪的重大事件都是由宗教问题和由此引发的对抗推动的。在西欧,新教和天主教的斗争,导致了各民族国家的最终解放和自决。……在东欧,为了捍卫自决过程和俄国民族以及其他东斯拉夫民族的民族意识,东正教与天主教徒发生冲突。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东欧和西欧的斗争是紧密相关的”。^①由此可见,同斯拉夫派一样,索洛维约夫也看到了俄国东正教与西欧天主教的差异甚至斗争,但他是从着眼“同一”角度表明东西欧历史的共通性和共融性。

俄国历史发展过程,同样面临在西欧历史发展中呈现的政教关系问题。在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叙述中,大主教尼康与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的纷争是俄国历史上的政教之争的典型事件。这次政教之争的结果是尼康最终败北,向沙皇俯首称臣。索洛维约夫据此说明,俄国与中世纪西欧(英国、法国)具有相同的历史发展趋势,即都遵循皇权高于教权的政教关系模式。

斯拉夫派与西方派知识分子在宗教认同问题上的区别体现在:斯拉夫派基于对西方教会已经“堕落”的评价,认为历史上从西方到东方的宗教传播以及由此带来的俄国宗教信仰的统一,无助于塑造俄国民族认同,“信仰的统一也未曾让人们团结起来,因为这种信仰在其来源地本身就已经被放弃,在那里人们已经感觉到它不可能再重建了”。^②斯拉夫派知识分子以俄国东正教为中心,勾画了一种以俄国为中心或将俄国作为一个历史发展过程顶点的俄国史观念。在斯拉夫派看来,东正教是俄国历史独特性和优越性的标识,也是将俄国与西方区分和割裂开来的分界标。

与索洛维约夫大体同期的瑞士文化史学家雅各布·布克哈特在其《世界历史沉思录》中主要探讨“国家、宗教和文化这三个大潜能”^③和这三者之间形成的六种相互制约的关系。其中,布克哈特论述了宗教对文化的制约“宗教对文化而言拥有母亲一样的身份……在现实生活中,宗教和文化相互吸引对方,并彼此利用对方”。^④与布克哈特类似,索洛维约夫也强调俄国东正教对俄国文化的积极影响和启蒙意义。但这种积极作用并不像当时的斯拉夫派思想家宣扬的那样,是通过“西方天主教腐朽堕落”和“俄国东正教优越”这一“对照”体现出来的。

索洛维约夫作为西方派代表,通过历史书写呈现东西方以基督教传播为中心的文化交流过程,由此强调俄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发展的统一性;通过呈现自俄国古代以来由西向东的宗教传播历程,展现俄国过去与现在的历史连续性,由此赋予俄国历史整体性。按照索洛维约夫的叙述,俄国与西欧是“学生”与“教师”的关系,俄国历史体现的是双方和平的文明传播和互动过程。俄国宗教认同历程是这一过程的集中体现。但是,索洛维约夫对俄国宗教认同历程的分析过多地突出了东西方历史的共同性,忽略了俄国自身的独特性,将西方描述为“文明福音”传播者也带有一厢情愿色彩。

在俄国史学史上,自12世纪初《往年纪事》以后,俄国东正教会和神职人员成为俄国的修史主

①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0. С. 375 – 376.

②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16页。

③ 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金寿福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页。

④ 雅各布·布克哈特《世界历史沉思录》,第92页。

体,“一般认为1113年编纂的《往年纪事》是基辅罗斯第一部较为完整的编年体通史。……由基辅佩切尔斯基修道院僧侣涅斯托尔编修”。^①同西欧中世纪时期的神本主义著史倾向一样,中世纪时期俄国的《拉夫连季编年史》和《福季编年史》等编年史作品也以教会事务为主要内容,成为基督教神学观点的史学注脚。《远古以来俄国史》体现了索洛维约夫的宗教世界观。他认为“基督教不仅是过去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而且是现在和将来社会进步的主要因素”。^②索洛维约夫的这种宗教中心主义倾向是其局限所在。不过,索洛维约夫过滤掉了中世纪以来俄国编年史传统中的神本主义传统,并没有将宗教历程中的人物活动看作上帝意志的显现,而是将有关宗教的历史叙述引入世俗化的轨道上来。

三、国家形成:俄国文明发展的现代趋向

索洛维约夫直接面对的俄国史学传统是卡拉姆津的史学观念。1812年,拿破仑率领法国军队入侵俄国。卡拉姆津12卷《俄罗斯国家史》(1816—1829年出版)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写成的。拿破仑入侵对俄国的“冲击”在卡拉姆津史学作品中形成的“反应”是保守的历史意识:反对法国大革命式的激烈变革;具体到俄国历史问题上,是反对走西方道路的彼得改革。索洛维约夫总结了这种史学现状“法国大革命的极端性质、对欧洲各个大国的冲击,法兰西帝国在法国大革命后对欧洲各个国家施行的暴力行为,又导致对革命运动的担忧。这迫使俄国思想家普遍敌视一切对旧事物的暴风骤雨式的攻击。此外,法国大革命强化了保守倾向。这种保守倾向明显体现在《俄罗斯国家史》作者卡拉姆津身上。卡拉姆津更喜欢伊凡三世,而不是彼得一世”。^③卡拉姆津这一历史立场与斯拉夫派思想家的观点殊途同归。斯拉夫派创始人之一康·谢·阿克萨科夫在《论俄国历史的基本法则》(1850年)中指出“斯拉夫人并没有形成自己的国家,斯拉夫人只是在召唤国家:他们没有从自己人中间挑选王公,而是去海外寻找统治自己的王公;他们没有把土地与国家混为一谈,他们把采用后者看作保存前者的前提。国家、政治体制并没有成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④西方国家发展道路是侵略、武力和征服,而“俄国国家的基础是自愿、自由与和平”。^⑤阿克萨科夫这种论证也代表了斯拉夫派反对西方的总体立场“斯拉夫派以其同样极为执拗的力量坚决证实这样一个观点,即世俗化在西方的必然性不是与基督教的本质本身相关,而是与西方对基督教的扭曲相关”。^⑥整体而言,斯拉夫派否定西方以国家为中心线索的世俗化发展进程。

与此相对,索洛维约夫将“国家”作为《远古以来俄国史》历史叙事的核心指向和最终皈依。他的前提是,俄国历史发展总体趋向是由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制度转向以政治关系为基础的国家统治“新秩序代替旧秩序,王公的氏族关系转换为政治关系。罗斯统一、强大、国内政治秩序变动有赖于此”。^⑦“年长王公与年轻王公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王公家族支系之间的氏族联系减弱。每个支

① 刘爽《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兼论俄罗斯史学的功能与特征》,第2页。

② Черепнин Л. В. Соловьев Как Историк. С. 26.

③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8. Москва, 1963. С. 542 - 543.

④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59—60页。

⑤ 霍米亚科夫、赫尔岑等《俄国思想的华章》,第61页。

⑥ 瓦·瓦·津科夫斯基《俄国哲学史》上卷,张冰译,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54页。

⑦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С. 57.

系都力图以其他支系权力为代价扩展自己的权力,并使后者在政治意义上附属于自己。……罗斯不同部分在一个君主权威之下趋向联合、集中与凝聚”。^①

862年,罗斯国家建立。^②在同期的西欧,“加洛林王朝当时开始解体,各个民族开始形成,各个国家开始塑造成为西欧联盟的成员。对东欧和西欧来说,九世纪是国家形成时期,是对现代直至当前欧洲历史有重要影响的时期”。^③索洛维约夫认为,九世纪的东欧和西欧都处于建立民族国家时期。这体现了东欧和西欧历史发展的同步性。在索洛维约夫的叙述中,留里克家族(王朝)和罗曼诺夫家族(王朝)前后相续的历史活动,表现了俄国国家建立、发展和壮大的历程。他将国家作为俄国历史叙述的起点和归宿,“国家在发展。国家从年轻发展到更高级阶段。国家发展的更高级阶段以集中和持久为其特征”。^④

同时,索洛维约夫也注意到俄国国家发展历程的渐进性。在氏族制度时期,罗斯大公权位的继承制度是优先权制“王公们持有整个家族统一和不可分割的观念。这体现在下述事实中:所有王公都有一个年长王公。这个年长王公始终是整个家族的年长者。这意味着家族任何成员都可能获得年长资历。这个年长资历不是只属于任何一个家族分支”。^⑤年长王公具有继承大公权位的优先权,也是大公的合法继承人。优先权制度基于整个王公家族在血缘上是统一的这一前提,按王公的年龄、在家族中的辈分确定年长王公。不同于父子相承的世袭制,优先权制度使大公权位不会局限于任何特定的王公支系家族。任何年龄长、辈分高的王公家族成员都有继承大公权位的可能性,“当年长王公或大公去世时,他的权威和权位不是传给他的长子,而是传给整个王公家族中的年长者。……这是统治家族内部的关系。这是继承制度”。^⑥由此,在大公权位继承方面,整个王公家族成员都有机会,都是“平等的”,不存在世袭制下的远近亲疏之分。

在索洛维约夫看来,优先权制度^⑦有助于维护王公家族的统一性和俄国领土的统一性,“当王公家族、留里克家族人数日众时,家族利益开始成为家族成员关注的首要事项。当作为统治家族的留里克家族君临天下时,情况更是如此。王公们共有全罗斯土地,将全罗斯土地看作整个家族不可分割的财产。其中,家族中最年长者以大公身份进行统治。其他亲属按照长幼顺序,统治其他或大或小的领地”。^⑧王公之间按照长幼顺序分得大小不等、地理位置远近不一、土地肥沃程度不同的领地。当整个王公家族产生新的年长王公和大公人选时,其首要事务是按照新的长幼顺序在王公之间重新分配领地。所以,每位个体王公都是自己所统治领地上“临时的”统治者,自己统治领地会因自己在王公家族中长幼顺序和辈分的变化而变化。从长时段发展趋势看,这种以血缘为基础的继承制度逐渐退出俄国历史舞台,“莫斯科王公开始统一罗斯领土。他们逐渐吞并其他公国。在莫斯科王

①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С. 56 – 57.

②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С. 134.

③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С. 130.

④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7. Москва, 1960. С. 314.

⑤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2. Москва, 1959. С. 344.

⑥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С. 56.

⑦ 瓦·奥·克柳切夫斯基在《俄国史教程》中将这种大公权位继承制度称为顺序继承制。虽然所用术语不同,但克柳切夫斯基的顺序继承制与索洛维约夫的优先权制在内容上是相同的。两者不同在于,克柳切夫斯基对顺序继承制持完全批判态度,认为古代俄国动乱根源就在于这种继承制度。索洛维约夫也注意到优先权制本身存在的缺陷和导致王公内讧的危险,但更强调优先权制在领土统一、王权集中等方面对俄国国家发展的积极意义。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教程》第1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张蓉初校,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85—208页。

⑧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С. 56.

公自己的家族中, 祖传氏族关系逐渐让位于王权”。^① 因为各个王公支系家族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实力强弱之分, 王公地位也由此出现了高下之分。王公之间由氏族关系时期“平等的”血缘亲属关系, 逐渐发展为“不平等的”政治从属关系。

俄国国家形成是《远古以来俄国史》呈现的论证线索, 其体现是由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制度向以政治从属关系为基础的国家过渡。索洛维约夫认为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是国家形成的重要动力。因此, 俄国国家历史研究的“重点应该放在不同区域之间的相互联系如何逐渐加强, 国家统一如何实现”。^② 具体而言, 这种联系首先体现在一个民族内部, 由分散、孤立到联系、统一的过程, “一个民族……对自身境况的意识以及随之产生的捍卫一个而否定另一个事情的有效动机, 取决于在一个地理区域内以活跃和多样的活动将广大民众集中起来。当一个民族通过足够的居民和相应规模的国家内在地统一起来时, 当他们通过不同活动集结起来时, 这使不同区域和人口不同部分形成一个不可分割且相互依赖的统一体”。^③ 强势王公的有效统治、强大公国的领土征服活动, 都是将俄国领土上的不同部分联系起来的手段, 由此推动了俄国领土统一和国家建立。

从欧洲历史的整体分析出发, 索洛维约夫概括出两种国家形成模式。一种是征服模式, 例证是罗马“在相对长的一段时间内, 由于不断努力和内在能量, 这类王国以相邻国家与民族为代价进行扩张。……这是罗马的经历”。^④ 另一种是有机形成模式, 例证是欧洲基督教国家, “新的、欧洲的基督教国家的形成具有不同性质。在这里……这些国家经历了漫长、艰难和痛苦的内部发展与成熟过程。当这种发展开始时, 这些王国通常在表面看来是分裂的。这种分裂逐渐让位给统一。一个新的国家就此形成”。^⑤ 索洛维约夫更强调有机形成模式。欧洲国家就是在有机形成模式下呈现为两个不同类别, 即日耳曼和斯拉夫, “基于统治者之间的内部关系, 新的欧洲王国可以分为日耳曼和斯拉夫两组。日耳曼王国以封建关系为特征。斯拉夫王国, 尤其是更为纯粹地保存了斯拉夫特性的罗斯, 以王公家族和氏族关系为特征”。^⑥ 索洛维约夫的分析体现了俄国与西欧在国家形成模式上的同构性, 同时也体现了俄国与西欧在国家发展道路上的差异性。

索洛维约夫呈现的俄国历史的现代趋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氏族制度在保持罗斯领土统一、大公权威和罗斯民族团结方面的作用, 为俄国国家建立奠定了基础。二是在氏族制度瓦解基础上, 莫斯科大公将王公之间由平等的血缘关系转变为不平等的政治从属关系, 建立俄国国家。

从社会发展形态角度, 索洛维约夫在《远古以来俄国史》中将俄国史划分为以氏族制度为代表的古代和以国家为代表的现代两个阶段。索洛维约夫根据“氏族”和“国家”这两个阶段的历时性发展, 具体将俄国历史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从留里克到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 氏族关系在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时期; 二、从安德烈·博戈柳布斯基到17世纪初, 氏族部落原则和国家原则之间斗争, 最后以国家原则的胜利告终; 三、从17世纪初到18世纪中叶, 是俄国进入欧洲国家体系的

①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 С. 58.

②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С. 14.

③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13. С. 27.

④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4. С. 654.

⑤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4. С. 654.

⑥ Соловьев С. М.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 Древнейших Времен. Тома 4. С. 655 - 656.

时期;四、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60年代的改革,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新时期”。^①在其整体历史叙事中,彼得一世时期是俄国现代国家发展阶段的起点,是俄国历史进程中的转折点与界标。索洛维约夫的俄国史理念仍带有一定的目的论色彩,即俄国古代氏族制度时期的发展历程,必然地和渐进地为俄国国家的形成与出现做准备。因此,彼得一世时期是在俄国自远古以来长期量变积累的基础上,实现质变的结果和体现,即俄国国家的形成。

结 语

索洛维约夫从“俄国与西方”关系问题这一总的前提出发,分析了俄国文明起源、宗教认同和国家发展问题。索洛维约夫着眼“俄国与西方”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同一性,同时也历时性地展现了其中的差异性。地理环境是东西方文明起源的共同基础。但西方具有的“地利”优势和俄国所处的“不利”地理环境,是俄国发展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由西方至东方的宗教传播历程,既是东西方共通性和联动性的体现,同时也是欧洲文明“中心”启蒙“边缘”的体现。国家形成是贯穿俄国和西方历史的核心线索与根本趋向。但俄国和西方基于各自历史环境,在国家形成模式和路径上又存在差异。就1861年农奴制改革前夕俄国社会争论的“俄国历史发展道路问题”而言,索洛维约夫给出的回答是:俄国应该学习西方,走西方国家的发展道路。索洛维约夫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并不是斯拉夫派哲学家的抽象论证方式,也不是西方派其他思想家片面强调俄国与西方相似性的路径。在俄国历史起源、宗教认同历程和国家发展趋向问题上,索洛维约夫的史学分析是差异与共性并存,但着眼共性。这也是俄国在西方“冲击”下,索洛维约夫展现出来的历史思维特点。

(作者郭丹,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周巩固,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邮编:130024)

(责任编辑:张旭鹏)

(责任校对:董欣洁)

^① Дмитриевым С. С., Ковальченко И. Д. Историк Серг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оловьев. Его Жизнь, Труды, Науч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С. 33.

image history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important stages based on the sources and natures of these images: from illustrations in traditional history books, independent collections of images, to specialized image studies. With the rise of cultural history in the 1980s, images became main research materials for some historians. In adopting cultural history research methods, the history of revolutionary images has become a common practice, whose goal is to study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people's mentality and emotions as well as the political culture during the Revolution. It provides new solution to examining issues such as the Revolution's differentiated appeals to various social groups. However, many challenges in adopting this research approach remain. Sometimes, information regarding the image production and communication processes is, for example, missing, and one cannot clearly identify the audiences for such research. At present, historians of revolutionary images strive to solve the probl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image history by breaking disciplinary barriers, connecting the history of images to traditional political history or social history, and sharing online resources.

Dona Torr and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 Chu Qingdong

Dona Torr, as one of the few female historians in the community of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mad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translation of classic works of Karl Marx, historical writing of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and communist movements in Great Britain. Although she had a background in linguistics, Torr was deeply interested in history, and spent her entire life on writing a biography of Tom Mann who was a leader of the British labour movement. The biography was one of the earliest Marxist historical monographs, celebrating the creative activities of common people of Tom Mann's times. In order to develop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Torr played a vital role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Historians Group, and had a great impact on the historical research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s of British Marxist historians, such as Christopher Hill and Edward Thompson. Through these efforts, Dona Torr laid the foundation for British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ergei Mikhailovich Soloviev's View on Russian History and Its Values // Guo Dan, Zhou Gonggu

S. M. Soloviev is a Russian historian who lived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He is considered a member of the "state school" and a "westerner" i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his twenty-nine volumes of *History of Russia From Earliest Times*, Soloviev articulates the following ideas in Russian history: On the issue of historical origin, geographical factors not only have shared Russian history in the *longue durée*, but they are also deep driving forces that construct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Russian (Eastern) history and Western European (Western) history. On the dynamic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 spread of religion from ancient times to modern times, from the West to the East, is a central theme in the process of communication and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East and the West, through which Russia has completed the ideological enlightenment and constructed its religious identity. On the issu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rend, the transition of the clan system based on blood relationship into a state based on political relationship is the central theme that runs through Russia's past and present, and the convergent trend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between Russia and Western Europe. Soloviev criticizes the views on Russian history both by the Slavophiles and Nikolay Karamzin in Russian historiography, and the latter used to dominate Russian historical circles at that time. In doing so, he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In his historical writing, Soloviev shows a strong concern of his contemporaneous society.

A Review of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Mainland China of the Past Hundred Years // Xu Liang

In recent years,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fluenced by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and Sino-U. S. relations,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the mainland of China has undergone through three distinctive stages of development in the past hundred years: the first stage (1920s - 60s) is the initial stage; the second stage (1970s - 80s), characterized by ample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of important American historical works, is the rapid development stage; the third stage unfolded since the 1990s, and it further the development by offering more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and rational thinking about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A review of the hundred-year development of the field will help us recognize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in the current research of American historiography in mainland China, and find creative ideas and new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